



王德威 著

史诗时代的 抒情声音

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
知识分子与艺术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史诗时代的 抒情声音

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
知识分子与艺术家

王德威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 / (美) 王德威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6

(文史新论)

ISBN 978-7-108-06447-9

I. ①史… II. ①王…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20世纪②艺术家—人物研究—中国—20世纪 IV. ①D693.71 ②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076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71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9.5

字 数 423 千字 图 42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6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致 谢 1

引 言 3

导 论 “抒情传统”之发明 16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有情的历史” 71

第二章 沈从文的三次启悟 116

第三章 梦与蛇 157

——何其芳，冯至，与“重生的抒情”

第四章 抒情与背叛 202

——胡兰成战争和战后的诗学政治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245

——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

第六章 斯芬克士之谜 295

——林风眠与现代中国绘画的写实与抒情

第七章 《小城之春》·《生死恨》 332

——费穆、梅兰芳与中国电影诗学

第八章 国家不幸书家幸 377

——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

尾 声 批判的抒情 425

参考书目 444

致 谢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一书承蒙多位学者、同人、学生提供资料及批评意见，谨此致谢。柯庆明、陈国球、郑毓瑜、蔡宗齐、黄英哲、廖肇亨、杨小滨、张松建等教授在不同阶段参与讨论辩难；廖静文女士、费明仪女士、徐庆平院长、台益公教授、沈龙朱先生、冯叶女士等惠赐图像及文字数据，尤其铭感于心。

本书各章分别由以下学者翻译，衷心表达谢忱。各篇译文均已大幅改写，论述及批注资料亦有多处增订，谨此说明。

引言：涂航先生，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导论：余淑慧教授，政治大学

第一章：陈婧菱教授，Middlebury College

第二章：余淑慧教授，政治大学

第三章：宋明炜教授，Wellesley College

第四章：吕淳钰教授，William and Mary College

第五章：杨小滨教授，“中央研究院”

第六章：杨小滨教授，“中央研究院”

第七章：陈思齐教授，台北大学

第八章：蔡建鑫教授，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尾声：涂航先生，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陈婧菱、高嘉谦、宋明炜、应磊教授，李浴洋、张博实博士，樊迎春女士，胡金伦、钟秩维、杨富闵、涂航、曲楠先生参与校对，特

此致谢。

台湾大学高嘉谦教授为此书中文版最重要的推手，从联络翻译到编辑策划均全力以赴；师生之谊，无过于此。东华大学刘秀美教授仔细校对全书并提出许多修订建议；中文版论述及批注远较英文版完备，刘教授应居首功。

三联书店冯金红女士，麦田出版公司林秀梅总编辑、林怡君女士、张桓玮先生、江灏先生及其他同人执行编辑工作，专业知识与细心态度在在值得敬佩。城邦出版集团总经理兼麦田出版发行人涂玉云女士、麦田出版公司陈逸瑛总经理、刘丽真编辑总监热情支持本书及其他拙作出版，在此一并致谢。本书出版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 Schofield Publication 项目赞助；第四、五、八章承蒙台大出版中心授予版权，敬致谢忱。

谨以此书，纪念导师 Arthur E. Kunst (1934—2013)。

引 言

“抒情”一词可能是距离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最遥远的词汇之一。这段时期中国重重忧患，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从新中国成立到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家国兴废，政治起伏，影响之深之广，堪称“史诗”时代亦不为过。如果以“抒情”名之，未免显得时空倒错，甚至有轻佻自欺之嫌。

然而本书强调，正是由于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经历如此剧烈转折，文学、文化抒情性的张力反而以空前之姿降临。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抒情论述和实践从来关注自我与世界的互动，二十世纪中期天地玄黄，触发种种文学和美学实验，或见证国族的分裂离散，或铭记个人的艰难选择。“抒情”之为物，来自诗性自我与历史世变最惊心动魄的碰撞，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维度亦因此而显现。

本书所讨论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难以被整合为一个同构型的团体：他们有自由主义信徒、左翼斗士、顽固的保守派、敌伪同谋者、意识形态转弯者，以及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者等。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也异常多元，包括诗歌、小说、电影、戏剧、绘画、书法、音乐、文论和政治宣言等。尽管背景不同，政治诉求有异，他们均以“抒情”——作为一种文类或艺术风格，或生命态度、价值体系、政治信念、世界观——来反思历史的危机与转机，群与己的关系，艺术与诗学的诸多形式。

更重要的是，“抒情”的声音并不独来自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现代西方批评界虽流派纷呈，各异其趣，然而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到阿多诺 (Theodor Adorno), 从布鲁克斯 (Cleanth Brooks) 到德曼 (Paul de Man), 诸多理论巨擘均曾援引抒情主义作为批判时代种种征候的依据。“抒情”因此有了极复杂甚至矛盾的定位: 既意味现代主义的病征, 也代表社会主义的美德; 既投射小资感伤情怀, 也呈显形上哲学隐喻; 既是形式主义的产物, 也是革命想象的结晶。本书所论的中国案例更为这一光谱增加繁复的色彩。

二十世纪中期的巨变影响深远, 在在呈现有如史诗般的宏大格局, 而处于当世的文学与文化人为何选择以抒情标记他们的心声? 这个时代的抒情话语究竟由何构成? 上个世纪抒情的感召与我们的时代有何关联? 这些问题都是本书期待讨论的主题。本书英文原题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语带双关。“Time” 除了指涉“时间”和“时代”, 也指涉音乐的“节奏”。借此, 我有意发挥此书有关声腔音调的母题, 不仅描写一个时代种种抒情声音, 更要探询这些抒情声音如何体现或颠覆了史诗的节奏和韵律。我对“抒情”与“史诗”的理解, 深受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 (Jaroslav Průšek) 的启发。^[1] 对他而言, 抒情和史诗不仅指的是规定文学文化的类型和风格,^[2] 更意味着一系列价值观念和规范社会认知范式的“感觉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3]

本书围绕两个主题展开。首先, 通过抒情话语对中国现代性两大主导范式——“启蒙”与“革命”——重做检讨。我提议纳“抒情”为一种参数, 将原有二元论述三角化, 亦即关注“革命”“启蒙”“抒情”三者的联动关系。此处的“情”是感情, 也是人情、世情; 是人性内里的七情六欲, 也是历史的情景状态。更进一步, “情”是本然真实的存在, 也是审时度势的能力。

[1] 有关普实克的论述, 将于导论中详述。

[2] 关于文学文化 (literary culture) 的讨论, 见 Sheldon Pollock, “Introduction,” in *Literary Cultures in History: Reconstructions from South Asia*, ed. Sheldon Polloc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以及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Journals and Literary Societie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3]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31.

我认为，革命的能量既源于电光石火的政治行动，也来自动人心魄的诗性号召；而启蒙虽然意指知识的推陈出新，但若无灵光一现的创造性情怀则难以成其大。然而要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抒情话语早已裹挟着时代的幽暗意识。据此，本书探勘传统诗学未能触及的矛盾：不食人间烟火的表述可能暗含暴虐与背叛的因子，狂热的意识形态可能召唤田园牧歌式的共鸣。更有甚者，抒情的精诚所至或不能至，竟可能以自毁——从自我批判，到沉默，到自绝——为代价。

其次，我认为这一抒情话语不仅从西方获得灵感，也从中国传统汲取资源。汉语中的“抒情”二字源于古代中国，同时具有自发的和喻象的、超越的和政治的维度。抒情从古典过渡到现代其实蕴含了中国文化变革的艰难途径。但现代中国抒情论述往往被西学所遮蔽，从席勒到里尔克，从华兹华斯到奥登，从普希金到马雅可夫斯基，都是常见的名字。相形之下，中国抒情传统反而隐晦不彰。缘此，本书各章致力谱系学阐释，试图发掘“古典”与“现代”失落已久的线索。我希望在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话语的双重语境下援引“抒情”，彰显此书在词源和概念层面的复杂性。

二十世纪中期的抒情论述充满相互矛盾的动机与实践，我所提出的问题未必能于本书完满回答。事实上，批判的声音已经时有所闻。对那些认为此书将现代中国文学“去政治化”的批评，我的响应是，当代中国“去政治化”的危机正是由于曾经万众一心的革命情怀——一种集体的，解放自我的抒情渴望——早已枯竭。马克思不是曾教诲我们，“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4] 这样的革命诗情于今安在哉！

对那些担忧此书偏离了“抒情传统”的批评，我的响应则是，我所谓的传统不是僵化的“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而是一连串的发明、反发明和再发明所汇集的洪流。最重要的，我并不把抒情话语看作解决现当代中国文学、思想问题的灵丹妙药；革命、

[4]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4), p. 18.

启蒙的配方显然也未奏全效。相对地，我视抒情为批判的界面，用以呈现中国后革命、后启蒙时代里，另一思辨现代性的方法。

• • •

在展开本书各章的论述前，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范式稍作回顾。首先，正如上文所言，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化史被“启蒙”与“革命”两大范式所主宰。^[5]这类范式充满了历史、政治急切性，深深影响学术研究的方向；历来奉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文化大革命”、启蒙和新启蒙运动之名的研究不知凡几。然而，如果“革命”与“启蒙”总预设了现代主体的能动性，那么这个主体如何能够感知政治行动和历史意识，也为其所感召，就不应该被忽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文化和艺术主体的呈现，从意识形态的狂热到滥情主义的放肆，从自甘堕落的颓废到愤世嫉俗的逃避，无不浸润于各式各样的情感和表达元素。然而我们尚未得见一种论述能像“革命”或“启蒙”研究那样，细致入微地体察、接受、批判现代中国“情”与“感”的向度。

学者和批评家热衷谈论革命、启蒙，对“情”的问题却是避之犹恐不及，似乎印证了林毓生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6]就是从知识论层次上，以总体一元论式的逻辑侦知、评论、解决所有家国、社会、个人问题倾向。这种论述其来有自，但在现代语境里蜕变为一种“强势思维”（strong thought of modernity）。^[7]

[5] 此说受到李泽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启蒙”与“救亡”理论的影响。李泽厚的观点在八十年代知识界争鸣中产生极大影响。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页7—50。

[6] 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第一章。

[7] 我的论述受到了 Gianni Vattimo 所提出的 weak thought 的影响。见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trans. Jon R. Sny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关于 Vattimo 概念的解析，见 Snyder 的导论：“对于现实的无穷可阐释使得我们能够讨论形而上意义上的存在与真理的弱化。Vattimo 支持虚无主义的消逝，认为无穷的可阐释性导致了现实的弱化，因为这使得一切被形上学认为是真实、必然和存在的事物沦为诸多可能阐释的一种罢了。”（xxii）Vattimo 的 weak thought 的理论来源于他对海德格尔 weak ontology 的解读，参见页 86。

在中国，这一强势思维源于晚清、五四，并在毛泽东时代达到高潮，不断诉求党国、主义、理性、集体性、刚性，和革命一以贯之的逻辑。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它突出宏观论述，唤起“崇高喻象”^[8]，以及构筑诸如“大国”“天下”之类的（史诗式）表征体系。对比之下，抒情话语显得柔软琐碎，似乎难以承受现代性的重责大任。^[9]

然而，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成就并不能被单一的强势话语所概括，何况所谓强势，也可能是虚张声势。例如，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之所以撼动人心，与其说是发出了直白的革命号召，不如说是暴露了作家和笔下人物挫折纠结的灵魂。鲁迅自承他的心意与《楚辞》到安德烈耶夫（Leonid Andreyev）的小说遥遥相应。周作人则通过日本美学和中国隐逸精神开脱自己的叛国行径，而瞿秋白慷慨就义，反映的不仅是烈士精神，也是佛教的虚无意识。^[10]此外，毛泽东的魅力并不完全来自他的领袖形象，而是他雄浑而浪漫的诗人气质使然。^[11]毛的诗歌一方面怀旧伤情，一方面睥睨天下、指点江山，在在展现独特的抒情禀赋。^[12]

[8]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许多中国文学界批评家与学者似乎不愿意将专业局限于“文学研究”，如果这意味仅对虚构的研究和对感性议题的分析，他们更愿意跨学科讨论更“真实”的政治与历史议题。“批判”“介入”“战术”与“能动性”已经成为当代批评的流行用语。而后殖民、帝国研究和生命政治的话语更是甚嚣尘上。我们似乎忽略了通过想象力，文学“虚构”得以质询“真实”的能量。相形之下，当代学界乐于将“批判”和“政治”视为具有理论先导性和道德优先性的文学实践。

[10] 见 Paul Pickowicz,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and Ch'u Ch'iu-p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15-16, 39-42.

[11] 见 Chunchou Zhang and C. Edwin Vaughan, *Mao Zedong as Poet and Revolutionary Leader: Soci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2)。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表达了他对《楚辞》的赞赏，直至1958年他仍然赞赏不绝。1959年，他甚至下令重新编纂注释《楚辞》，并在庐山会议中分发。见陈晋，《毛泽东之魂》（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页103—105；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上），页184。

[12] 这包括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忆秦娥：娄山关》（1935）；《送瘟神》（1958）。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00、52、104。

我认为，“强势思维”如果的确刚强，就能够容纳，而非清除、戒备诸多抒情表意的方式。革命行动能够摧枯拉朽，恰恰因为内里蕴含着一种温柔的、“他心直指我心”（singular plural）的乌托邦渴望。^[13]早在二十年代，朱谦之（1899—1972）就大声呼吁革命的动力无他，“唯情”而已矣。朱的“唯情”论融合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哲学、左派王学，以及虚无主义美学，在当时并非主流。^[14]但历史后见之明却见证他的“革命”即“唯情”的论述最具创意、也最具杀伤力。时至八十年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启蒙”之道屡屡被“救亡”“革命”的迫切号召所压制，必须改弦易辙。^[15]但容易忽略的是，李同时呼吁新时期的中国人应该重拾“新感性”和审美判断力，以其作为弥补、延续启蒙与革命所未完成的现代性大计。^[16]九十年代以来，李泽厚甚至提出“情本体”力抗后现代、后社会主义狂潮。^[17]李泽厚的“情本体”熔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康德美学、儒家思想为一炉，和一甲子以前朱谦之路数颇有不同。而他在“告别革命”之后提出此说，当然更引人深思。

早在五十年代，李泽厚便在“美学大辩论”中以检讨朱光潜的

[13] “Singular plural”的说法见 Jean-Luc 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trans. Rober Richardson and Anne O’Byr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 朱谦之，《发端》，《周易哲学》，收入《朱谦之文集》（福州教育出版社，2002），第3卷，页101—106。《发端》内容曾以“唯情哲学发端”为题，1922年发表于《民铎》第3卷3号。萧铁，《一个唯情主义者的发明——朱谦之的“我”兼论现代性的“内转”》，《思想与文化》，2016年10月，第1期，页172—191。有关朱谦之《革命哲学》的讨论，见 Tie Xiao, *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17), chapter 2。对现代中国情的论述综合，参见方用，《20世纪中国哲学建构中的“情”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有关朱的讨论，见第3章。

[15] 同注〔5〕。

[16] 李泽厚，《美学四讲》，收入《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页531—535。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63-180。

[17] 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页203—252；《情本体：两种道德与立命》，《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页255—280。

唯心主义和蔡仪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战成名。^[18]经过四十年的生命和思想历练，他提出“情本体”是深思熟虑的结果。^[19]他认为一代中国人面对“文革”后的精神废墟，必须反思启蒙与革命范式的不足；眼前无路思回头，中国主体性的自我更新离不开对“情”^[20]的思考与培育。徘徊在康德、马克思和儒家之间，李泽厚折中主义的倾向有待商榷。^[21]吊诡的是，他对“情”的关注竟然有了官方的回声。2005年官方提出“和谐社会”^[22]，2013年的呼唤“中国梦”，都挪用了抒情性修辞。2017年又有“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更是唯情是问了。仿佛之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告别了革命与斗争，肯定和谐之必要，梦之必要，“抒情”之必要。

第二个论点旨在针对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内在/外在模式，提出批判。半个多世纪前，夏志清先生将中国文学的精神概括为“感时忧国”。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文人是如此困于民族国家危机，以致将他们对中国现实的厌恶转化为一种受虐狂式的结论：他们将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与国民性的腐败都归结为中国所独有，以全盘否定的

[18] “美学大辩论”发生在1956至1964年。通常认为这场辩论由三个学派主导：推崇马列主义美学的蔡仪，追随唯美主义的朱光潜以及兼治康德美学及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李泽厚。李泽厚既批驳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立场，也反对蔡仪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李泽厚提倡从人类与客观世界互动而产生的“历史积淀”来讨论美感的生成，并且强调自然到文化转变中人的能动性和感性的重要角色。

[19] 关于李泽厚学说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见张伟栋，《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20] 李泽厚，《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页158—251；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p. 175。

[21] 见Liu Kang, *Aesthetics and Marxism*, pp. 163-174；Gu Xin认为李泽厚的折中主义背后是黑格尔式的总体性美学，见Gu Xin, “Subjectivity, Modernity, and Chinese Hegelian Marxism: A Study of Li Zehou’s Philosophical Idea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6, no. 2 (1996): 205-245。另外见李泽厚的回应，“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A Respons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9, no. 2 (1999): 174-183。

[22] 2005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最先提出“和谐社会”的观念：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全面和谐的社会。“和谐”二字有深厚的儒家根源，在儒学中指的是通过礼乐实现社会和谐。

逻辑来定义中国的现代性。^[23]夏志清的批判也许有其理论限制，但无碍后之来者的对话。周蕾从中国文字和视觉文化中看出了“原初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 中国作家和电影人倾向以荒凉落后的自然景观和弱势群相，来体现中国面对现代性冲击所产生的爱恨交织的心态。^[24]石静远(Jing Tsu)则指出现代中国身份政治是基于一种“失败情结”。^[25]与此同时，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和林郁沁(Eugenia Lean)分别讨论了私人 and 公众领域的“同情”，^[26]李海燕呼吁学界关注现代中国“心的革命”，^[27]而黄乐嫣(Gloria Davies)则从当代中国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争中发掘了“忧患意识”的情怀。^[28]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王斑有关“崇高形象”(sublime figure)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把崇高看作文化启迪与提升的过程，对个人和政治圆满的崇高极致的奋力追求，阻挡危险与威胁的身体防御机制，供大众效仿的不断更新的英雄人物，身体的傲岸形象，或者是使

[23] 夏志清注意到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不同的是：尽管他们和西方同道一样心怀对现代文明的不满，中国作家是如此地被中国的危机所困扰，以至于无法把对中国人民政治和道德命运的关注扩展为对人性的普遍关怀。中国作家急于展示一些西方同道们无法企及的道德标准，然而“感时忧国”的代价则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对西方优越性的天真信念。C.T. Hsia,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ppendix 1 of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33-554.

[24] Rey Chow,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 Jing Tsu, *Filat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6] 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chapter 3; 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27]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关于 heart/mind 的话语以及中国思想现代性的进一步讨论，见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刘纪蕙，《心之拓扑：1895事件后的伦理重构》（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1）。

[28] Gloria Davies, *Worrying about China: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人形容枯槁的极端消沉与叫人振奋的无比狂喜。正是依靠这些过程与形象，我们净化并且压抑一切带有人性色彩的特性，如食欲、情感、理智、感官、想象、恐惧、激情、欲望、自利等，由此，过于世俗的人性就升华成了超人甚至非人。”^[29]

这些极富洞见的分析大多从西学中的主体性、精神分析和情动力（affect）理论中汲取灵感。诚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原本就是中西合璧，因此没有必要在理论层面刻意追求本质主义化的中国论述。但我们仍不能忽视学界“西风压倒东风”的现象：论现代中国心灵，往往必须假道阿甘本到齐泽克、弗洛伊德到拉康等西方论述，却忽视中国传统中同样丰富的理论资源。事实上，我以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章太炎的“大独”和“无我之我”^[30]，朱光潜的“静穆”^[31]，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一样充满思辨潜能。本雅明笔下的“浪荡子”在中国语境里四处游荡，而胡兰成更为相关的“荡子”^[32]却乏人问津。近年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受到学界追捧，而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33]却仍有待发掘。

[29] 王斑著、孟祥春译，《引言》，《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2。

[30] 章太炎的庞杂思想在中文学界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这一领域著名的相关著作包括：陈雪虎，《“文”的再认：章太炎文论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5章《留日时期的周氏兄弟与“文学复古”》；张春香，《章太炎主体性道德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2章《“依自不依他”——章太炎主体性道德哲学原则论》、第3章《“大独”——章太炎主体性道德人格论》；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3卷，第10章《无我之我与公理的理解构》。英文学界的研究，见 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Leiden: Brill, 2011)。

[31] 参见本书第一章的详细讨论。

[32] 见本书第四章关于胡兰成哲学的详细讨论。

[33] “抒情考古学”一说最先由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汪曾祺提出，见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自选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页104。文中主要讨论沈从文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古代文物的兴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转向艺术史的学术研究。沈从文可视为现代中国乡土抒情的代表人物，他的情怀可以追溯至巫楚文化。不同于五四时代对启蒙主体的自发性强调，沈从文认为文明劫毁无常，而试图发掘流变中微隐的抽象价值。见周仁政，《巫覡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长沙：岳麓书社，2005），页2—3。

当前学界普遍视五四启蒙运动为一股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思潮。我却要提请注意，五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学贯中西的学者，能够自由地从外国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例如，鲁迅的现代主义不仅受惠于尼采和施蒂纳（Max Stirner），而且也来自陶潜、嵇康的熏陶。^[34]王国维不仅试图通过康德和叔本华哲学解决他的存在危机，也从佛教的“境界说”中获得灵感。朱光潜的学术求索不仅包括尼采、克罗齐、马克思和维柯，也包括“情景交融”的传统诗论。^[35]宗白华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却也试图融合康德、黑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艺术——如《易经》、音乐、山水画——构筑其美学。^[36]此外，试图从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美学中寻找共鸣的批评家、小说家和诗人数不胜数：李长之、李健吾、废名、沈从文、卞之琳和梁宗岱等皆在其列。

二十世纪中国的抒情诗学文论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专利。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国第一本鲁迅专论——里提出，尽管鲁迅摆出革命姿态，内心却诗意盎然，而鲁迅的檄文只有在以抒情手法写就之时才最具批判性。^[37]李长之的论著深刻影响了竹内好关于“回心”的论述。^[38]左翼评论家胡风的革命理论与卢卡奇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互通款曲，也同时带有孟子心学的影响；^[39]艾青的诗论离

[34] 英文学界有关鲁迅对中国传统的复杂承袭，见 Eileen J. Cheng, *Literary Remains: Death, Trauma, 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chapter 2。

[35] 晚近学界对于朱光潜的比较研究，见夏中义，《朱光潜美学十辩》（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6] 晚近学界对宗白华的中国美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批评，见杨雍华，《宗白华与“中国美学”的困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7]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页 49—51。

[38] 见刘伟，《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 1 章《绪论：“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 2 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本视角”的历史与现状》。

[39] 见郜元宝，《鲁迅六讲》第 1 章“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论》、第 2 章《神思之心和学之心——文学与学术的分途》中，对鲁迅与心学关系的论述。邓腾克详细论述胡风及其弟子路翎的文化政治与孟子学说的关系：Kirk Denton, *The Problematic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u Feng and Lu L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s 1-3。